

相差三十岁半月怎么可能是黄歇的白月光？——楚考烈王记事^④

沈国冰



与质子相对应，联姻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惯用的一种外交方式。

联姻，当然是政治的延伸。

比较著名的联姻，当数春秋时期的秦国和晋国，以至于“秦晋之好”一直沿用至今，成为男女双方缔结美好婚姻的代称。

不独秦晋，战国中后期，秦楚之间几乎代代都有联姻。

1

公元前 328 年，时年 16 岁的楚威王的庶公主、楚怀王的同父异母妹妹半月，被选中作为楚威王的嫡公主、楚怀王的胞妹半妹的陪嫁(媵侍)，半妹和半月这对同父异母姐妹，同时嫁给了秦惠文王嬴驷。

众所周知，在秦武王嬴荡因举鼎受伤突然去世后，秦国王室经历了一场风雨腥风，半月和秦惠文王所生的儿子嬴稷成功接任秦王之位，是为秦昭襄王，半月自尊为宣太后。

嬴稷是嬴荡的同父异母弟。

雄才大略的秦昭襄王嬴稷只有两个儿子，长子嬴悼被立为太子，次子嬴柱被封为安国君。不幸的是，太子嬴悼在魏国为质时去世。幸运的是，次子嬴柱接位太子。

秦昭襄王嬴稷不仅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王，他还创造了两项惊人纪录：一项是其在位时间长，担任秦王长达 56 年；一项是其长寿，享年 75 岁。他是春秋战国时期长寿、在位时间较长的君、王之一。

太子嬴柱日渐苍老，须发如雪。但在漫长的等待中，太子嬴柱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耐力和教养。

在悲喜交集中，秦昭襄王嬴稷走完了他的 75 岁的一生。秦王的权位近在咫尺，胜券在握，彼时，太子嬴柱已经 51 岁了。

得悉秦昭襄王嬴稷崩逝，太子嬴柱的正妻华阳夫人不禁泪流满面，不知她是悲痛流泪还是喜极而泣。

华阳夫人心疼地抚摸着她深爱着的太子嬴柱的白发，说：妾以为太子等不到这一天了呢！

然而，朝思暮想的秦王宝座，还是不能立即坐上去。

秦王权柄虽然触手可及，却不能立即握在手里。

因为，按照秦国王室礼制，新王必须先王守孝满一年，才能正式登基。

于是，太子嬴柱无怨无悔地为先王嬴稷守孝整整一年。

在这“准秦王”的一年里，他做了大量实事、好事。

公元前 250 年，五十二岁的嬴柱正式登上秦王之位。

然而，非常诡异和悲情的是，三天之后，嬴柱突发疾病，不治而死。

嬴柱也创造了一项几乎无人可以超越的纪录，在任秦王三天，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在任时间最短的君、王。

嬴柱死后，谥号孝文，此为秦孝文王。

2

在秦国后期，秦王室内的楚系力量异常之强大。

除了半妹以及后来居上超越半妹的半月宣太后，秦孝文王嬴柱的正妻华阳夫人，同样来自楚国。由于史料的缺失，华阳夫人究竟是来自楚国王室还是屈、昭、景贵族，不得而知。

嬴柱对华阳夫人极为宠爱和信任，即便华阳夫人并没有给嬴柱生下儿子，但这丝毫没有动摇嬴柱对于华阳夫人的宠信。

虽然嬴柱和正妻华阳夫人没有儿子，但嬴柱和他的姬、妾们却生有二十多个儿子。

也就是说，嬴柱并不缺少儿子，只不过他和正妻华阳夫人没有儿子而已。

嬴异人就是嬴柱和夏姬所生的儿子。

历史的千载难逢机遇，被嬴异人敏锐地抓住了。

在赵国为质的嬴异人，结识了超级富商吕不韦，在吕不韦的帮助下，娶到了赵国贵族之女赵姬，赵姬给嬴异人生下儿子嬴政，也叫作赵政。

在吕不韦的雄厚资本加持下，嬴异人赢得了华阳夫人的信赖。从赵国邯郸逃回秦国咸阳的嬴异人，被华阳夫人认为义子，改名子楚，被立为嗣子，后来被立为太子。

从嬴异人改名子楚，可以窥见楚系力量在秦王室之

强大，也可以想见华阳夫人深埋于内心的母国情怀。

嬴柱去世之后，嬴异人成为秦王，此为秦庄襄王。

嬴异人担任秦王后，尊封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尊封自己的生母夏姬为夏太后。

然而，登上秦王权位的嬴异人，却并没有忘记或者抛弃仍然滞留在赵国邯郸的赵姬、嬴政母子。

嬴异人在吕不韦的舍命帮助下，从邯郸逃回咸阳时，和母亲赵姬滞留在邯郸的嬴政只有三岁。

当上秦王的嬴异人，把嬴政和赵姬从邯郸接回咸阳之时，嬴政已经九岁。

回到咸阳的赵姬，被立为王后，嬴政被立为太子。

在个人情感上，嬴异人和他的父王嬴柱十分相似。

嬴柱之于华阳夫人，嬴异人之于赵姬，他们父子对正妻的感情执着一而专一，不仅能共苦还能同甘，更没有始乱终弃，也不会上岸先斩意中人。嬴柱和嬴异人父子，在整个春秋战国所有君、王之中，对于情感的执着和专一，几乎无人可以与其比肩。

楚人半月宣太后、华阳夫人，她们因为联姻而来到陌生的秦国，在凶险的秦王后宫，她们凭借美貌和智慧，征服了她们的王。她们都是人生的赢家，站上了即便很多男性都仰望而不可及的巅峰之上，极大影响着一定时期秦国的内政、外交，也极大影响着秦国后期的历史走向和进程。

3

在半月(公元前 344 年——公元前 265 年)出生整整三十年之后，公元前 314 年，后来名震列国的战国四君子之一、楚相春申君黄歇出生了。

也就是说，半月比黄歇年长整整三十岁。

公元前 328 年，十六岁的半月离别楚国陪嫁秦国之时，黄歇还没有出生。直到十四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 314 年，黄歇才降临人世间。

依据这一历史事实，可以判定，由于年龄的巨大差异，他们出生在不同的时代里，半月和黄歇在他们各自的青春时期，不可能有任何情感交集。

直到四十二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 272 年，四十二岁的楚国左徒黄歇，陪伴着年仅十七岁的楚国太子熊完，从楚国来到秦国为质子。

在秦都咸阳，楚国左徒黄歇和秦国宣太后半月可能才有了他们此生的第一次交集。

彼时，宣太后半月已经七十二岁了。

楚国左徒黄歇四十二岁。

他们之间，不仅隔着三十岁的年龄差，还隔着地位的巨大沟壑。

山高水长。

很显然，他们之间绝无可能发生任何情感上的交集。

4

综上，可以进行以下人物之间关系的脉络梳理。

其一：宣太后半月和楚考烈王熊完之间的血缘辈分关系。

半月是楚威王的女儿。

半月是楚怀王的同父异母妹妹。

半月是楚顷襄王的姑姐。

半月是楚考烈王的姑妈。

也就是说，宣太后半月是楚考烈王熊完的姑奶奶

辈，考烈王是半月的孙子辈。

用今天通俗的话来讲，半月是考烈王的姑奶奶，考烈王是半月的孙子。

其二：楚考烈王熊完和秦王嬴政之间的辈分关系。

考烈王是秦昭襄王的女婿。

秦昭襄王是秦王嬴政的曾祖父。

那么，考烈王熊完是秦王嬴政的姑祖父。

用今天通俗的话来讲，考烈王是嬴政的姑祖父，嬴政是考烈王的孙子辈。

其三：半月宣太后、华阳夫人、赵姬之间的辈分关系。半月宣太后是华阳夫人的婆婆。

华阳夫人是赵姬的婆婆。

其四：半月宣太后和秦王嬴政之间的血缘辈分关系。秦昭襄王是嬴政的曾祖父。

半月是嬴政的高祖母。

嬴政是半月的玄孙。

半月和嬴政之间是嫡亲，用今天通俗的话来讲，嬴政是半月的亲玄孙，半月是嬴政的亲高祖母。

如此看来，嬴政的身上流淌着楚人的血脉，有着楚人的基因和血统。

5

仔细梳理秦、楚末年，两个大国之间纵横交错、纷繁复杂的辈分伦理关系，是一件很费劲却很有意义的事情。

这相当于历史考证，也近乎于去伪存真。

看秦楚，却怎么也难以看清楚。

似乎握手言和，又好似翻脸无情。

有时候温情脉脉、浪漫无限，有时候却又刀光剑影、血流成河。

所有费尽心力地梳理，都是为了正本清源，尽可能还原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真实和本源。

电视剧《半月传》里，半月和黄歇被描述为一对恋人，半月还是黄歇的初恋。

编剧对历史真实的异化，给予了大众极大误导。

泛娱乐化的引导，造成了大众对于半月和黄歇之间关系的误解。

半月和黄歇，他们出生在不同时代，他们之间年龄相差整整三十岁，半月怎么可能是黄歇的初恋？

6

她有着倾世容颜，还有着冰雪聪颖，更有着超乎常人的谋略。

她能取半妹而代之，从地位卑微的八子，一路逆袭，赢得秦惠文王嬴驷的宠宠。杀开一条血路，把自己的儿子嬴稷扶上秦王权位。她首开太后监国之先河。她当之无愧，配得上杰出和伟大。

当然，半月还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

她不仅有义渠王，她还有魏丑夫呢。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现在，她又有了黄歇。

未曾想到，二千多年后，经过电视剧《半月传》的文学演绎和虚构，黄歇居然成为了半月的“绯闻男友”。

如此虚构历史，半月和黄歇如果有知，他们会作何感想？

还有，黄歇的正牌“绯闻女友”李嫣如果知道，她又该作何感想呢？

元末义军首领刘福通两下寿春城

孙友虎

“打响文化资源牌”之“淮南历史文化颍英”（第九季）大型征文

元末政纪不纲，义军以“亡宋为名故”四起。栾城人韩山童“烧香惑众”，称“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江淮一带“多信之”。颍州人刘福通与其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等言“山童，宋徽宗八世孙，当主中国”(《明史·韩林儿传》)。元至十一年五月，刘福通等辅助韩山童在颍州颍上县白鹿庄准备起兵，推韩山童为明王，不料消息走漏，元兵包围白鹿庄，韩山童被殉牺牲。刘福通突出重围，提前起义，攻克颍州城。因起义军头戴红巾，身穿红衣，打着红旗，老百姓称之为“香军”或“红军”，队伍很快发展到“众至十万”(乾隆《颍州府志》)，迅速攻占了河南、安徽的十几个州县，包括当时的安丰路。

元代的安丰路，治所与辖县寿春同城，“领司一、县五、州一”(《明史·地理志》)，“司”指安丰路录事司，下辖寿春、安丰、霍邱、下蔡、蒙城五县。“州”指濠州，领钟离、定远、怀远三县。安丰路，元末最不平静的寿州，群雄并起，成为奠定大明基业的发祥地。而录事司所辖五县很少被提及有关“战事”，平静得近乎出奇，连“击安丰”的主战场也不甚明了，值得探究。

刘福通起义一波三折，而安丰路则成为他人生拐点的“救命稻草”。元代至元十五年二月，刘福通派人到砀山夹河一带找到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把他迎到亳州(今安徽亳县)奉为皇帝，称“小明王”，建国号为“宋”，年号为“龙凤”。元顺帝立即令丞相脱脱率大军前往镇压。是年十二月，刘福通带着韩林儿撤退到安丰，避开了元军的攻击。刘福通所据的安丰城，不是指安丰路所辖的安丰县城(今寿县安丰塘西北)，而是指安丰路所在的寿春县城(今寿县县)，这有后来朱元璋为亲历“击安丰”(《明太祖实录》卷十二)的开国功臣徐达撰写的“神道碑”可证。这一次，他与“小明王”在寿春城逗留两年多时间。

至元十六年九月，刘福通以“小明王”的名义，兵分三路进行北伐，直击元大都。至元十八年五月，刘福通攻占汴梁(今河南开封)，把韩林儿从安丰(寿春)迁来汴梁，以汴梁为都城。至元十九年八月，元军攻下汴梁，刘福通被迫带着韩林儿又退保安丰，第二次居于寿春城，持续三年多时间。至元二十三年三月，投降元朝的张士诚派大将吕珍攻打寿春，形势危急，据朱元璋《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书右丞相征虏大将军魏国公赠中山王谥武宣徐公达神道碑》载，“张士诚北寇寿春，朕亲往援，王为前部，张兵败北，旋师金斗，周围其城。”文中的“王”，指徐达，因其卒后被封为“中山王”；“金斗”，代指庐州。(明)佚名《明本纪》亦说：“至正癸卯(二十三年)，张士诚北寇寿春，上亲往援之，以徐达为前锋，破其军，旋师围金斗城，陈友谅复大举兵寇豫章，乃命

解金斗之围，以舟师往援。”王崇武在《明本纪校注》之《序》中指出，“余以此书与《实录》校，知二者确乎有关联，惟此书并非《实录》性质，且其成书较今本《实录》早，故为研究明史之重要资料也……可能为修史之原料，亦可能抄自《实录》初修本，要就史料价值言，远胜于今本《实录》矣。”(《明太祖实录》《明史》等官方史料说，此次刘福通派人向朱元璋征兵求救，朱元璋救出“小明王”，刘福通却被吕珍所杀。

民间对刘福通之死，却有另一个版本。

(元)权衡《庚申外史》卷下云：至正二十六年，“先是，小明王驻兵安丰，为张士诚攻围，乘黑冒雨而出，居于滁洲。至是，朱镇抚具舟楫归建康。小明王与刘太保至瓜洲渡，遇风浪掀舟没，刘太保、小明王俱亡。”文中“刘太保”，指刘福通，因其“自为丞相，称太保”(陆深《平胡录·宋》)。

明代陆深《平胡录·平宋》云：“(至正)二十三年癸卯二月，士诚遣其将吕珍入安丰，攻宋刘福通等，据其城。太祖率徐达、常遇春亲援之，珍解围去。福通奉韩林儿奔安丰，退居滁州……”

历史可创造，但不容修改。“击安丰(寿春)”，朱元璋首先算是“政治账”，把“小明王”引为已用，结果发生两大战略“误判”：一方面据有湖广等地，以“汉王”自居的陈友谅趁机袭击豫章(今南昌市)，朱元璋被迫令徐达救援，另一方面雄踞浙西、淮、吴诸郡，与当时史称“北吴”的“吴国公”朱元璋抗衡的“南吴”张士诚，“遂乘简略定濠泗汝颍地”，使朱元璋一时间深陷“夹击”的困局。

“小明王”和刘福通，对朱元璋来说，是个必须直面的选项。亲率徐达、常遇春等驰援安丰(寿春)时，刘基就持反对意见；一旦救出，如何处置？韩林儿与刘福通被朱元璋接往滁州宗阳宫。两年后的隆冬，朱元璋遣左丞廖永忠用船，迎韩林儿、刘福通来应天(今南京市)，却溺死于扬州瓜洲渡。

元朝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寒冷而无奈，次年“吴王”朱元璋的吴元年纪元悄然升起，再次年即是大明洪武元年的蔚蓝天空。

《明太祖实录》《明史》等官方史料，说刘福通死于张士诚手下吕珍之手，以撇开曾奉小明王“龙凤年号”的连带关系。《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九《元史纪事本末四卷》道出其中的缘由，“至正二十六年，韩林儿之死乃廖永忠沈之瓜步。洪武中，宁王权作《通鉴博论》已明，著其事不过以太祖尝奉其年号，嫌于顶羽义帝之事，归其狱于永忠耳。邦瞻更讳之，卒罕尤为曲笔。”(《明史·廖永忠传》这样作结：“初，韩林儿在滁州，太祖遣永忠迎归应天，至瓜步覆其舟死，帝以咎永忠。”

制造“覆其舟”惨案的廖永忠，一个喜好猜度心思的人，给元末“小明王”及其“代言人”刘福通的“龙凤年号”画上句号，岂料也为自己的厄运埋下了伏笔：洪武八年三月，终被疑心过重的朱元璋以僭用龙凤之名赐死。

“淮楚文化”研究的学术任务与前景

高 旭

楚文化大家谈（第三季）征文

淮南日报社 淮南淮河文化研究中心 联办

2024 年以来，在武王墩楚墓考古发掘成果的现实促动下，淮南市学术文化界开始深入研讨“淮楚文化”，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意识到了“淮楚文化”具有极为丰富独特的历史内涵，其学术研究前景十分广阔。但究竟应该如何系统开展“淮楚文化”研究，如何着眼实际的学术实践来审视其学术前景，为淮南楚文化的良好发展奠定坚实的学理基础，仍是尚未得到充分讨论的重要议题。因此，尝试性探索以上问题，提出初步的看法与主张，实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当前淮南市楚学、楚文化发展的现状来看，推进“淮楚文化”研究，迫切需要重点解决三个方面的基础性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淮楚文化”能否真正被开拓成为楚学、楚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得到全国学术文化界的普遍认可，从而拥有毋庸置疑的学术地位及前景。

第一个基础性问题“淮楚文化”的概念界定与阐释。对淮南市学术文化界来说，当务之急的任务即是对“淮楚文化”概念持续展开严肃而周详的研讨。在

以往楚学、楚文化研究里，“淮楚文化”通常只是作为一个概念并不明晰的“词语”或“提法”来使用，无论是淮河中游的安徽省淮南市，还是淮河下游的江苏省淮安市，俱为如此。也因之，“淮楚文化”的概念长久以来在楚学、楚文化研究中被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处于十分边缘的境况。不要说同“荆楚文化”相比，即使同“湘楚文化”“巴楚文化”相较，都甚为逊色，远未得到全国学术文化界的广泛认可。随着武王墩楚墓考古发掘取得前所未有的重大成果，淮南市拥有了研讨“淮楚文化”的学理内涵，彰显“淮楚文化”的独特魅力的先决格局的关键所在。唯有着力解决最核心、最基础的“淮楚文化”的学术概念问题，方可为淮南市楚学、楚文化的长远发展奠定第一块基石，也才能让“淮楚文化”的学术研究在淮南沃土上扎下深根，日渐得到全国学术文化界和本土广大民众的理性认同和广泛接受，而不是陷于自说自话、流于形式、无足轻重、响应寥寥的困境。反之，如若淮南市学术文化界在这一首要的基础性问题上能够取得令人信服、启人深思的重要

成果，那么“淮楚文化”概念将有可能真正融入到全国性楚学、楚文化研究的洪流之中，得到应有的重视，获得应有的学术地位，而且有可能进而促成全国性楚学、楚文化产生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来，极大地丰富现有的楚学、楚文化学界的广泛认可。与此同时，淮南市学术文化界也能将自身所论“淮楚文化”同江苏省淮安市所言“淮楚文化”进行明确的学术辨析，揭示出二者的“异”“同”关系，更好地为淮南市推动“淮楚文化”学术研究、文化传承、活化利用创造有利条件，并为未来两市之间就“淮楚文化”展开深入的交流研讨和密切的文化合作，提供必不可少的学理前提。因此，无论是从哪一个方面着眼，“淮楚文化”的概念界定与阐释，都是当前淮南市学术文化界的紧迫任务，这是事关淮南市楚学、楚文化发展的“关键一棋”，其所具有的重要性将会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得到充分验证。

第二个基础性问题“淮楚文化”的学术体系构建与论证。在基本概念界定与阐释的基础上，淮南市学术文化界需要进一步深化思考关于“淮楚文化”学术体系的构建问题。这一问题虽然当前已有专家学者有所涉及，但还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对“淮楚文化”学术体系应包括的具体内容究竟为“何”

的研讨并不充分。“淮楚文化”的学术体系应如何构建？或可从“纵”“横”“通”三个层面着眼。“纵”者，是从全国性、流域性楚文化的历史演变入手，深细研探先秦以来楚文化在淮河流域、淮南地域的发展情况及特点，对“淮楚文化”的演进历程取得整体性、阶段性的双重认知，以此凸显出“淮楚文化”学术体系的历史维度，夯实其得以构建的历史基础；“横”者，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哲学、文学、文字、艺术、器物、科技、水利、交通、建筑、都城、民俗等多元化视角系统研究“淮楚文化”，发掘其有别于“荆楚文化”“湘楚文化”“巴楚文化”“吴楚文化”的特色内容，让“淮楚文化”学术体系构建具有丰富充实的人文内涵，能够全面反映出楚文化在淮河流域、淮南地域的发展成就及大放异彩之处；“通”者，乃是从以古鉴今、古为今用的立场出发，充分发掘“淮楚文化”的现代性价值，保护传承、活化利用“淮楚文化”的历史遗产，阐发“淮楚文化精神”对现代淮南城市建设所能起到的裨益效用，并探索“淮楚文化”历史资源融入淮南城市转型发展的实践路径，推动其转化成为文旅经济、文化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助力。凭借以上三个层面的学术开拓，“淮楚文化”学术体系或可逐步构建起来，最终成为全国性楚学、楚文化研究

中极具特色的重要构成，也为淮南市楚学、楚文化的健康发展日益累积出深厚可靠的学术底蕴。

第三个基础性问题“淮楚文化”的学术定位与价值诠释。“淮楚文化”的定位问题有赖于概念的界定阐释、学术体系的构建完善这两大任务的逐步完成，但不可否认，对“淮楚文化”展开学术定位问题的探讨，却需贯穿于“淮楚文化”研究的全过程。即使在以上两大任务仍无法彻底解决之前，专家学者们都应将此重要议题置于优先地位来考量。始终放眼全国性楚学、楚文化的发展，来探究“淮楚文化”的存在根由及价值意义，这有利于促进淮南市学术文化界不断深化有关“淮楚文化”研究的阶段性反思，引发积极的学术“刺激”效应，更能迫使专家学者们直面“淮楚文化”研究中所存在的各种无法回避的难题，从而强化其攻坚意识，为“淮楚文化”真正在学术文化界扎根，开展更加严肃理性的研究工作。因为，事实上，不断追问“淮楚文化”的学术定位与价值意义究竟何在，正是为了从根本上解答“淮楚文化”——概念，抑或学术体系，皆是如此——存在的合理性问题。客观而言，以上三个基础性问题解决，实则是无法截然分开来处理的，三者之间交缠着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紧密关

联。每一个基础性问题的深入研讨，总是要兼顾其他两个问题的审视与反思，总是要从“淮楚文化”的整体性出发来把握，才能较好地实现各个基础性问题的阶段性解决，促其走向更进一步的讨论。为“淮楚文化”争得立身根基，让其成为能与“荆楚文化”“湘楚文化”“巴楚文化”一样毋庸置疑的学术概念、体系和领域，这是当前淮南市学术文化界全力推进楚学、楚文化研究的理所必然的落脚点。

总而言之，“淮楚文化”研究的兴起，得益于淮河流域、淮南地域所拥有的极为丰厚的楚文化资源，得益于武王墩楚墓考古发掘带给世人的空前震动与惊喜！在已有的楚学、楚文化研究领域之外，开拓出一个此前为学界所忽视的新领域，将其用“淮楚文化”的学术标识和旗帜来彰显，乃是大有可为、大有前景的学术探索实践。尽管“淮楚文化”研究任重道远，以上三大基础性难题尚有待于淮南市学术文化界合力攻关，逐步破解，但是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出现，却是淮南市楚学、楚文化崛起发展的宝贵契机，同样是淮南市学术文化界有可能大有贡献于安徽楚文化、中国楚文化研究的难得机遇。凡为新生事物，其生命力都极富蓬勃之朝气，未来前景都极值得世人期待，“淮楚文化”，当作如是观！